

论陶渊明田园诗之“大人”形象

——以《归园田居(其三)》和《饮酒(其五)》为例

赵新新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 广西南宁 530006)

摘要: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从事田园诗创作的诗人。他以自己的农耕生活为内容,通过描写优美的田园景物、简朴的田园生活,向我们展现出其闲适恬淡的心境。因而在大部分读者看来,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主人公形象是“静穆”的。然而,通过运用四层面分析法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加以解读后,笔者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是一位“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大人形象。

关键词:陶渊明 田园诗 主人公形象

中图分类号: I 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4)04-0020-(04)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田园生活为内容真切写出自己躬耕之甘苦的诗人。其田园诗以平淡朴实的语言、自然率真的风格取胜,钟嵘由此将其评为“隐逸诗人之宗”,但他“并不是闭眼不关心现实的人”^[1]。

一、陶渊明田园诗与四层面分析法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面对污浊的现实,他选择归隐,但并未放弃大济苍生的壮志,故诗歌中一度流露出“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2]。众所周知,“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甚”^[3],而陶渊明却亲自参加劳动,并通过田园诗来表现躬耕之甘苦。诗人的田园生活是极为丰富的,在这里他能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也可以与相熟的农民“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还有邻里之间“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的宴饮,以及“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的天伦之乐。

人们在对文学作品加以解读时,除考虑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作家的写作水平等因素外,还必须注重文学的内部研究。为此,雷纳·韦勒克和沃伦在其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四层面分析法。它们分别是:声音层面,谐音、节

奏和格律;意义单元,它决定文学作品形式上的语言结构、风格与问题的规则,并对之做系统的研讨;意象和隐喻,即所有文体风格中可表现诗的最核心的部分,需要进行特别探讨;象征和神话。他们认为韵文是语言声音系统的一种组织,声音是构成其审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声音层面对诗歌加以分析,主要是从节奏、格律和押韵三个方面对诗歌进行研究。语言是文学艺术的材料,“诗歌不是一个以单一的符号系统表述的抽象体系,它的每个词既是一个符号,又表示一事物”^[4],因而语言研究对于诗歌研究是极为重要的。意象是主观的“意”和客观的“象”的结合,是赋有某种特殊含义和文学意味的具体形象。隐喻则是把相互之间似乎缺乏联系的词句结合在了一起。象征是指“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5]。神话是“一种叙述、故事;与辩证的对话与揭示性文学相对照;它是非理性的,直觉的”^[6]。在对陶渊明的田园诗进行解读时,只有兼顾到以上四个方面,才能对其中的主人公形象做出相对完整的把握。

二、分析《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

《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是表现陶渊明躬耕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简介:赵新新(1990-),女,广西民族大学2013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生活的田园诗,游国恩先生认为诗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7]。袁行霈先生则在这一基础上指出,“这是一个从仕途归隐田园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而在农耕生活的描写背后,隐然含有农耕与为官两种生活的对比,以及对理想人生的追求”^[8]。

(一) 仄声的冲击——叹耕植之苦者

齐梁声律论是在永明末周颙发现四声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此之前,诗歌的创作讲究的是自然声韵,且多与音乐相关,陶渊明的诗歌也不例外。“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以仄声为主,饱含诗人对豆苗稀疏杂草茂盛的不平。它以平声结束,韵脚落在i上,随着整句诗声音的被拉长,诗人内心的不平也被消解为淡淡的无可奈何。“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属于平起平收。诗歌的前半句以平声为主,感情十分温和,这与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早晨心境相对平和的客观事实相契合。诗人劳作的目的是为了清除杂草,平声的使用切合了当时诗人的心境。后半句以仄声为主,很容易使人感受到诗人劳作一天后的疲惫。“道狭草木长”以仄声为主,诗人晚归的道路狭窄、杂草丛生,这多少加重了诗人内心的疲惫感。其后的“夕露沾我衣”虽以平声结尾,韵脚落在i上,却不能完全中和前半句诗歌所造成的紧张和压抑,反而增添了无可奈何的色彩。“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以平声为主,平起平收,这句诗的情感逐渐趋向平和,很大程度上缓和了“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所造成的紧张、压抑感。因而,笔者认为这首诗通过对仄声的大量运用,充分表现了诗人自身的耕植之苦。

(二) 劳作的悖论——哀民生之艰者

诗歌在开头就提出了一个悖论,辛勤劳作的正常结果应是草稀豆苗盛,但诗人躬耕却成为“草盛豆苗稀”,一些学者也由此认为陶渊明是不擅长劳作之人。但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的少年时期就是在柴桑的农村中度过的,并因家境贫寒以劳作为生,那么诗人在出仕前和归隐后从事劳作的生涯并不短,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笔者认为,在此处陶渊明通过运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了底层劳

动者的生存之艰。魏晋时期战乱频仍,底层劳动者生活十分艰辛。“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同第一句是因果关系,也是诗人对民生之艰的具体描绘。从诗人的劳作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田夫野老的稼穡之难。“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是诗人的晚归图。夜晚本身就会带给人一种沉重感,尽管有“月”,但它所能照亮的地方却是有限的,而道路狭窄、草木丛生也将这种沉重感加深了。“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诗歌的结尾点明了诗人的追求——不违背志向,保持品性纯洁。由此,笔者认为诗人再现自己的劳作场景实质是对社会底层的劳动者生存之艰的反映。

(三) 黯淡的意象——忧国运之险者

中国古典诗歌中,意象的使用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早在战国末期,屈原的《离骚》就使用到了“香草美人”的意象。“美人”用来喻君王或自喻;香草一方面象征着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与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恶草”是恶势力的象征。这首诗中涉及到“豆苗”和“草”两种意象——“豆苗”富有勃勃生机,是美好事物的代表;杂草则会阻碍“豆苗”生长,属于恶事物。从诗歌的内容而言,“道狭草木长”和《离骚》中的“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有异曲同工之妙。朱东润先生曾对后者作出如下解释:“路,指国家的前途。幽昧,昏暗。险隘,危险狭隘。”^[9]“道狭草木长”原是诗人晚归途中对客观环境的再现,然而将先生的解释加诸其中便成为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同时,“夕露”这一意象为诗歌添上沉重、没落的意味。因而,笔者认为这首诗通过运用“荒秽”“月”“狭道”“草木”“夕露”等带有黯淡色彩的意象,表现了诗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

(四) 自由的追求——思守志之难者

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众多文人迫于生存,或随波逐流,或遗世独立。而诗人虽选择归隐,但却又不同于一般的隐士,正如《朱子语类》中所载“晋宋间人物,虽曰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谈,那边一面招权纳货,渊明却真个是能不要,此其所以高于晋宋人也”。这首诗理解的关键在于“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一句。整首诗歌展开的原因在于“草盛豆苗稀”,因而,诗人的“愿”无非是庄稼有好的收成。上文

已经提及“道狭草木长”实是对社会环境的真实反映，从这一层面来说，诗人的“愿”则是归隐田园、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此外，诗人还提出了一个哲学命题：如何不受外界环境影响而保持自身心性。就这一角度来说，“愿”则是陶渊明崇尚自然的表现，他在以“自然”为美消解人生的苦恼的同时，还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

由此观之，这首诗既有诗人返归田园后“带月荷锄”的超脱，也有对耕植之苦、民生之艰的感叹，在超然与否的矛盾中，诗人塑造出了一位行走在天地间的“大人”形象。

三、解读《饮酒·结庐在人境》

《饮酒·结庐在人境》一诗中有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写，也有对客观环境与主观精神之间关系的阐释，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其中的主人公视作超然世外的隐士。

（一）平声为主，以彰隐居之闲适

《饮酒·结庐在人境》这首诗以平声为主，韵脚落在an上，使得诗歌节奏舒缓徐迂，与诗人田园生活中心境的闲适相契合，同时与诗歌中“采菊”“南山”“山气”“飞鸟”等田园的景物也是极为符合的。

（二）悖论开头，以现心境之悠然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点明诗人在“人境”结庐，却没有车来人往的喧嚣。这既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又表明诗人虽归隐田园，但并未遗世独立。“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对第一句的回答。既未能离群索居，那诗人是如何做到心无挂碍的呢？因为“心远”——“地”的偏与喧取决于“心”的近与远，真正的隐士高人原不必穴居岩处远离人世，只要心不滞于名利则自可免除尘俗的干扰^[10]。“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两句“意与境会，妙和无垠。‘悠然’二字既是指心情之悠远，也是指南山之悠远，在偶一举首之间心与山悠然相会，自身遂亦与山相融，仿佛成为一体”。“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那日夕的山气，归还的飞鸟，在诗人心里构筑成美妙的风景。“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承接第三、四句而来，诗人在“东篱采菊、悠然见山、山气夕佳、飞鸟归巢”的场景中悟出了真理，那是一种心与境的瞬间感应，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诗人悟

出这一真理的关键在于“还”，是返归的意思，也就是陶渊明所追求的抱朴含真、返归到未受世俗污染的状态。因而，单从语义层面来理解的话，我们很容易认为这首诗是表现诗人田园生活之闲适与心境之悠远的田园诗。

（三）美化意象，以显壮志之不忘

诗歌第一句中的“车马”是“交往”的借代意象，诗人选择归隐是对他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性情的一种返归，但也并非仅限于此。从《劝农》中的“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无因”不难看出诗人的价值指向在于古时的圣人之治。“诗人复返‘性本自然’，是远离人性异化的否定，而心之向往又恰是‘大济苍生’之志的变相肯定。……诗人之所以‘结庐人境’，不离群索居，正因为这种‘真性’使得诗人不可能放弃人生价值关怀，放弃人生的意义的求索”^[11]。君主顺天之德，则天下承平，百姓真淳；反之则民心趋伪。“于是佐君王以续其德，新礼乐、淳风俗以济苍生，便成了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最高方式”^[12]。因此，抱朴含真的实质成为守而待复，独善其身也演变为大济苍生的一种特殊形态。陶渊明因其志存高远便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但又因壮志未酬，只好通过对劳动生活的意象化、审美化来求得心无挂碍。然而在田园生活中，诗人对社会的黑暗反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本以为“力耕不吾欺”，但却过上“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的困窘生活。此时诗人的心中，审美与生活已不是一体，那他该如何坚守气节、大济苍生呢？“‘酒能怯百虑，菊为制颓龄’，诗人所剩下的选择也只有纵情于酒以忘忧，审美会意以寄愁了”^[13]。“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王瑶先生对此有如下注解：“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征象。”如此一来，采菊便是为了求得南山之寿，延年的目的则在于守而待复，以期明君出现获得圣人之治。从这一层面来说，诗人实质上处理的是如何在恶劣客观环境中实现自身远志的问题，尽管只是抱朴含真、守而待复，但他毕竟比之前走得更远了一步。

（四）生死之辨，以消人生之苦闷

魏晋南北朝文学属于乱世文学，作家在这一

时代背景下很容易产生人生短促之感。“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历来注家对这两句诗的解释都是有些含糊其辞的。逯钦立先生认为：“真意，自然意趣。《庄子·渔父》：‘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欲辨已忘言，是说归鸟群使人感受到真朴自然意趣，忘了再去辨析。”^[14]龚斌也明确指出：“真意，指委运自然之意趣……是‘理’与‘道’，然又绝非抽象之哲理，而是新鲜生动之意趣。”^[15]而钟优民先生在《中国诗歌史·魏晋南北朝卷》则点明“真意”中包含诗人“对人生真正意义的认识”。上文已经提及诗人的远志由于生活困窘而受到怀疑，他的守而待复也变得苍白无力。此情此景之下，他心中的苦闷哪里是通过“采菊”“见南山”就可以轻易化解的呢？极度的绝望和冷静之中，诗人与日夕的“山气”和“飞鸟”相遇。“日夕”指的是黄昏，诗人由此联想到人的暮年，“‘南山寿’的意象终于实现了价值意向性转换，成了入息（日夕）、入暮（日暮）的象征。自由的归鸟，欣然有托的恰是死亡”^[16]。在对死亡和思考中，诗人有所超越，并对满腹的愁苦有所消解。

因而，这首诗既有对闲适的田园生活的描写和对客观环境与主观精神之间关系的讨论，也不乏守而待复、大济苍生之志的阐释。在静穆与非静穆、超然与非超然的矛盾中，诗中主人公的“大人”形象得以彰显。

四、“大人”——悖论中的和谐

荀子曰：“美善相乐。”陶渊明归隐田园，过上恬淡闲适的隐居生活，实是对“美”的一种追求，是对老庄“道法自然”这一理念的践行。同时，他虽然辞官归隐，但并未离群索居、遗世独立，而是叹耕植之苦、哀民生之艰，时刻不忘守而待复、大济苍生，这是对“善”的践行，是对

儒家“法先王”思想的外现。在对美与善的追求和践行中，诗人最终返璞归真。因而，陶渊明田园诗中的“静穆与非静穆、超然与非超然”的悖论实是儒道两种思想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诗人最终实现了真善美的和谐，回归自己未经世俗异化的真性情。因其“并非浑身是‘静穆’的”^[17]，所以最终才能成长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的大人形象。

参考文献：

-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86.
- [2][3][7]游国恩.中国文学史(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276.
- [4][5][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1.
- [8]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二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4.
- [9]朱东润.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36.
- [10]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
- [11][12][13][16]张国安.陶渊明:一次千年不辨的文化冒险[J].人文月刊,2004.12.
- [14](晋)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79.89.
- [15](晋)陶潜著,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222.
- [17]鲁迅.“题未定”草七[A].鲁迅全集(第6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430.

(责任编辑 秦川)